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王國斌回應

Reply to the commentaries

doi:10.6752/JCS.201409_(19).0010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王國斌(R. Bin Wong);李立凡(Li-fan Lee)

頁數/Page：85-9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回應

《文化研究》第十九期（2014年秋季）：85-90

王國斌回應

Reply to the commentaries

王國斌著，李立凡譯

R. Bin Wong, Translated by Li-fan Lee

〈近代早期到近現代的中國：比較並連結歐洲和全球歷史變遷模式〉有機會出版，我心懷感激。首先我想感謝邀我赴臺的劉紀蕙教授，以及將我的英文文稿譯成中文的諸位同學和同事們。這篇文章旨在闡明中國史學者整合諸般歷史敘事時所面對的一項恆常挑戰（當專攻不同時期和地區的史學家企圖將他們的研究與更大的世界或全球歷史框架聯繫起來時，這項挑戰變得尤其嚴肅）：中國史學者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史學家一樣，日益有志於將自己的工作貢獻給世界各個地區彼此相互平行、分殊且終將有所聯繫的歷史。這些歷史整體創造了我們的全球現況。歷史家們越來越對以下這種預期懷抱高度的警覺：地球上眾民族與各地方將朝向一個共同的未來而匯聚，而這個共同的未來則是由西北部歐洲和美國率先實現的特質所界定。如同那些歷史學家一般地，我們發現很難建立衡量的方法，藉之辨識世界各地之相似與差異如何影響它們邁上各種歷史變遷之路。本文提出的策略建議乃針對三大問題領域：宗教與政治的關係、財政政策與作法的演進、以及工業化的過程。我也很榮幸在早先的系列演講（也是本文的底本）中收到六位不同學科和史學專長的學者之評語（其中五位提供了書面的評論）。

第一個主題是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此節最為困難，且需要額外增寫始能避免本文所引致兩位評論人之誤解。朱元鴻教授展開其評論的方式大體上與我框架下述問題的方法相同：該如何解釋何以似乎遍及全球的政治化宗教(politicized religion)現象並不包括中國大多數地方之宗教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參見 Mark Juergensmeyer

ed.2013: 234-254) 朱教授好奇我是否基於歐洲的情形，而對中國宗教與政治關係裡的世俗性格強加問題。他也無法理解，在中國以11世紀為比較宗教與政治關係的起點，是基於何種邏輯而做的選擇。宗教和政治是適用於所有社會的普遍範疇，然而，兩者間關係可能截然不同。我的用意並非強使中國適於歐洲歷史之特點，而是要展現宗教與政治之關係在歷史上如何及為何這般不同、而這又如何影響了相較於其他地區而在某一地區更常看到某些類型的現象。針對中國而從11世紀著手的道理是因為中國國家管理宗教作為(religious practices)的工作在宋代開始成形，這是我先前所稱「新儒家社會秩序議程」(neo-Confucian agenda of social order)之更大統治策略的一環。(Wong 1997: 105-126) 我們可見此時期國家企圖建立凌駕於宗教作為（這些作為既演變自地方傳統與經驗、亦來自如中世紀天主教廷般更大的宗教體制）之上的官僚秩序。根據 Harold Berman (1983)的得獎著作，我主張歐洲的宗教與政治關係有一關鍵特點是基督教規(canon law)及其作為他種法律之模範的角色，進而間接為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基。中國宗教與政治關係之關鍵則非法律而是官僚體制，而此一官僚體制對宗教（正如對其他地方社會實踐事務一樣）的作用是由地方菁英的努力所補全的。此論證非關法律在中國和歐洲的角色，而是關於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因此要求我談論中國法律或者解釋歐洲行政官僚體系的形成（此為稍後世紀才發生的現象）都沒有太大意義。處理這些主題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我們偏離歷史上政治與宗教關係的焦點，而政治與宗教的關係正是影響著宗教與政治的聯繫在更晚近時期之所以有不同可能途徑的原因。

當我們談到更晚近的時期，朱教授認為歐洲國家選擇了不要穿透(penetrate)社會而將如宗教之類事務留給人民自己。當然，正如我也希望能夠充分描繪，在國家特權(state prerogatives)舞台的確立過程中，宗教被置入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領域之內。然而西方國家對社會的穿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更為世俗的計畫；那是19世紀的一項計畫：為人們建立軍事服務，為增加中的年輕人口提供基礎教育(primary education)，為人們精心打造意識形態的籲求(ideological appeals)、訴

諸他們身爲一個民族而共享的歷史並以此爲大眾社會認同的基本面向。國家對社會的這些穿透普遍被理解爲近現代國家的特點，其中許多在 James Scott 的 *Seeing Like a State* (1998) 中已獲有效說明了。

朱教授所提起的最後一項顧慮和鐘月岑教授相同，也就是說，依據我的論證該如何理解1949年後的政策及作爲，以及在我文中涉及的於1960年代臺灣嶄露之新穎且重要的、以佛光山爲奠基者和領袖的佛教組織。我認爲，若從歷史的視角來看政治與宗教的關係，則我們可理解中國政府對星雲大師毫無保留地接納的這個現象。兩位的評論都擔心從歷史視角來觀察1949年後的中国會掩蔽了毛時期的新與變。我則認爲，應該更加普遍認知到的是，我們太過習於關注1949年的分界所致之斷裂，以及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和體制作爲之重要影響。藉著提出歷史視角，我並非建議以此取代較爲慣常公認的視點，而是作爲關鍵性的補充，因爲這有助更理解許多中國當今作爲之方式（在此所論爲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尤其，這些作爲之方式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全球趨勢之運作不盡相同——此即本文該節的起始點。這個申論並非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與先前帝制中國政府相同，如此顯而易見的一點就不必多作強調了。

同樣的歷史視角幫助我們了解慈濟此一非政府組織(NGO)之效能的出現。我前文提到了更廣泛的新儒家社會秩序議程，它給以菁英爲基礎的社會行動(elite-based social initiatives)保留了相當的空間，而以菁英爲基礎的社會行動很能符合爲人普遍理解的、有關如何促進社會秩序的一整套政治議程。就歷史而言，宗教組織及活動充滿了大部分的中國社會空間，此即勞格文(John Lagerwey 2010)所論中國作爲一「宗教國家」之所本。我想要澄清，我認爲將中國稱爲宗教國家與把國家想像成具世俗性質都問題重重，因爲在我看來國家非屬世俗亦非宗教，如此將宗教領域和國家範疇二元對比的情形並非鑄於中國歷史之內。這個看似曾被大多數社會中的官員和人們所共享概念範疇，其實是不久之前才在中國出現的。

然而，在中國環境中形成的政治與宗教的分野，如今在歐美卻不再如此清楚區隔。歐美的宗教團體追尋積極的政治議程，削弱了世俗

和宗教的區隔。而伊斯蘭教主導的國家其宗教在政治中的音量普遍遠大於1990年代之初所見，當時學者更加意識到全球化已經創造一種始於1980年代的新世界，福山(Francis Fukuyama)則在1992年寫下長達一整本書的宣言，聲稱我們已行抵「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福山的誤解並非在於經濟全球化其實沒發生，而在於他遺漏了全球化也包括政治化之宗教日益突顯的現象（包括福山的後續著作在內的許多人都提到了這一點）。我處理中國和歐洲的政治與宗教則尋求連結起這些從11世紀就開始顯著分歧的模式；此一做法肯認了對於了解世界各地的變異而言，歷史有著持續的相關性，而且，這些地區毋庸置疑地一如人類史的其他時期一樣是彼此相連的。

我對約莫自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歐洲財政史的討論，得到審慎研究過中國經濟史和政治史的學者的兩份評論。我同意何漢威教授發表的一系列觀察，包括指出所謂帝國的龐大規模必然導致其效能低下的這項聲稱在經驗上是錯誤的，證據是何教授提到18世紀中國的糧價奏報制度(grain price reporting system)、或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與我及其他三位合作同仁於近二十五年前發表的社倉系統(civilian granary system)之研究：《養民》(*Nourish the People*, 1991)。何教授也提到18世紀時國家被批評徵的稅收過少、尤其不符地方政府所需，而至19世紀時轉向商業稅。針對18世紀徵稅不足的批評，我只想補充一點，類似何教授對 Bartolomé Yun-Casalilla 所主張帝國原則上效能低落的回應。我們必須觀察官員如何與菁英合作籌募非一般計畫所需的資金且得以使資金在帝國內周轉，和文凱教授的觀察就提及此二點。針對後1949時期，何教授提出與本文宗教和政治一節的評論者相似的顧慮，亦即1949年後的差異遠遠大於任何歷史上的相似點。我的回應是，這些差異可被理解為在一條與其他國家極為不同之道路上的各種變遷，也就是說中國回歸到依賴汲取農業而非商業與工業的道路上。此一變遷有違更普遍的近現代期望；要領會這個移轉，方法之一是將此變遷置於歷史的視角中。歷史視角之目的與其說是在聲明延續性，不如說是強調辨識路徑依賴式的變遷型態。

和文凱教授評語的開頭簡潔概述了我的取徑，接著提出對公共財

的極佳討論，並促使他問了有關「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一詞的重要問題。此一詞彙是被研究的歷史人物(historical actors)所明瞭的，抑或是我所提出的觀察者的範疇？它其實是觀察者的範疇，我在本文中使用它，是朝向我在後續有關中西「良好治理」觀念的長篇討論著作的第一步。該詞在西方甚為通行，而且是出現於非常不同的議題群組中：即，它是與關於企業如何運作的問題一同開始的。就眼下目的而言，我希望我們對此詞只聚焦於中國人擁有判斷政府表現良好或低劣的實質衡量標準。最後一點是何、和兩位教授對我在已變遷的歷史條件之間尋找連結性所提出的意見。再次地，這些疑慮呼應了針對本文宗教與政治一節兩位評論人提出的意見。在我已經對此主題做出之說明以外（那些原則於此仍適用），我想增加一點：中國作為一個帝國和當代國家的空間尺度，提醒我們在考量跨越不同時間而可能有的連結方式時，應該要注意其連結方式是無法在歐洲的情境中發現的，因為歐洲國家的空間規模總是較小的。僅在非常晚近歐盟才建立一個規模與中國相近的政治空間，而此一歷史變遷的意涵是，要了解當今歐洲特定財政作為和更普遍的治理之問題，應該以擁有與大型政治空間相搏之長遠歷史的中國為一增益的視點，而不僅縮限於考慮歐洲本身。

黃克武教授的評語以及摘要另一位評論人陳國棟教授所提出的關於中國工業化議題，非常思慮周延地指出：我所提出的經濟史研究取徑，與傑出的思想史家（包括張灝和墨子刻[Thomas Metzger]）探究20世紀思想和社會之變遷議題的方法之間，有若干相似之處。正如他所指出且同意的，我強調歷史人物本身所使用之範疇的重要性，我的取徑自當採藉思想史家使用的詮釋策略。而我認為自己對工業化的論證不同之處，在於試圖估量：歷史人物對工業化之於他們有何意義之理解，不僅反映和影響政策制定者和大小企業家(entrepreneurs)考量工廠生產和較小規模的工藝製造活動時的決定，而且，還將正面遭遇經濟學所解釋的工業化之可能性和問題。因此，雖然將解釋一個經濟史現象的工作連結到其他研究的方式有很多，但本文該節仍有一些關鍵成份是特意要探討作為經濟過程的工業化議題。

總結而論，本文三節均各有其特定的問題群要面對，第一節是關於國家形成的特定面向，第二節是政治史與經濟史交會的問題，第三節則直截了當是經濟史主題。整體而言，本文可說是一個例證：如何辨識長期歷史變遷與轉型之特點是一項重要的挑戰。而歷史變遷與轉型，使中國在近代早期和近現代歷史的經驗連結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尤以歐洲和美國最為顯著）。這篇文章也希望有助於我們區別世界不同地方循以行至今日、且可能繼以邁向未來的各條道路。

引用書目

一、外文書目

Berman, Harold J.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ergensmeyer, Mark, ed. 2013. *Thinking Globally: A Global Studies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gerwey, John. 2010. *China: A Religious Stat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ill, Pierre-Etienne and R. Bin Wong, with James Lee. 1991.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ong, R. Bin. 1997.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